

國家圖書館

自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

年 度：105

執行期限：

計畫名稱：抗戰時期央圖留港遭日劫掠圖書尋獲過程之探討

研究人員：黃文德、唐申蓉、陳麗玲

目 次

目次	i
摘要	ii
一、前言	1
二、1941 年底以後央圖留港遭日劫掠圖書之過程	3
三、提供央圖在港遭劫掠古籍下落的貢獻者與消息來源 ...	6
四、顧毓琇尋訪古籍之說的謬誤形塑與真相	11
五、結論	19
參考文獻	21

摘 要

有關探討國立中央圖書館在戰時購藏古籍論述，特別是戰時央圖暫存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遭日軍掠奪之古籍，以及戰後歸還問題，相關研究多以當事者蔣復璁館長所稱，係由他委託我國駐日軍事代表團代為訪查被日本劫運去的善本書，然後被代表團成員上海市教育局長顧毓琇在日本帝國圖書館找到，再經與日方洽商後收回，陸續運回南京。本文認為，顧氏尋獲善本的說法，有種種疑點。為了瞭解央圖留港古籍遭日劫掠圖書尋獲過程，本文將透過相關文獻分析與史料爬梳，釐清相關研究之觀點來源，藉由敘事研究取向，探討各方說法的遞變過程，以期獲得這些被研究者建構出來的尋寶者們是如何加入或者被附會為 1946 年尋獲央圖流落日本境內古籍的貢獻者。最後，本文彙整各方所提出之探索央圖善本下落，分析現象與人際關係資源運用，認為真正引導代表團、外交部派駐港澳官員訪得善本者，應屬當時參與遠東委員會之英軍博薩爾少校與隸屬香港軍政府軍事法庭之調查官端納少尉之貢獻。

關鍵詞：駐日軍事代表團、顧毓琇、陳君葆、蔣復璁、博薩爾、端納

抗戰時期央圖留港遭日劫掠圖書尋獲過程之探討

一、前言

近年來有關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年更名為國家圖書館，英文仍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在抗戰前後之館史研究，由早期僅臺灣學者於圖書館界發表相關論文，隨著冷戰時期歷史意識形態的改變與檔案文獻資料開放，亦逐漸成為近代中國建構近代圖書館發展史重要的一環，如館舍播遷、國際交換、搶救古籍、書刊管制、戰後接收、追索日本掠奪圖書文物、文物運臺，率皆有相關學術機構與研究人員有計畫長期投入，蔚然成為同時跨越圖書資訊與文史相關科系領域之議題。

有鑑於研究國家圖書館館史對於描繪近代東亞圖書館譜系（genealogy）的重要性，國家圖書館館史研究群近六年來已進行包括「抗戰前後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務經營與播遷相關史蹟調查——以南京、重慶為例」（2015）、「胡適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之關係」（2015）、「圖書館事業百年史：以國家圖書館為中心探討國立圖書館變遷與發展之意義」（2010）。在以上計畫研究過程中，幾乎所有涉及戰時購藏古籍論述都會觸及所謂1941年底日軍侵略香港後，掠奪央圖暫存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Fung Ping Sh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之古籍，以及戰後歸還問題。

對於這段歷史，當事者央圖蔣復璁（1898-1990）前館長在 1979 年於《近代中國》所登載〈我與中央圖書館〉一文提到：

委託我國駐日軍事代表團代為訪查被日本劫運去的善本書，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這批書籍被我代表團的顧毓琇先生在日本帝國圖書館找到，經與日方洽商後收回，先後陸續運回南京，失而復得，彌足珍貴。¹

另外，在 1984 至 1985 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之口述訪談中，蔣氏也提到：

民國二十九年，我化名蔣明叔從香港潛赴上海，與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密商，主持收購善本事宜。在上海蒐購時，我本來預備將這些善本書送交香港馮平山圖書館，在那邊成立辦事處，裝好箱，轉交美國國會圖書館，勝利後再搬回來。但奉教育部之命必須於每一書內蓋章，費時三個月，誤了好幾班船，後來香港淪陷，這批書就被日本人搬走存放東京帝國圖書館。抗戰勝利之後，顧一樵先生前往參觀，因為圖章的關係，認出其中一批係中央圖書館之藏書，於是再將之運回南京，居然一本不缺。目前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室有洋鐵版的書箱就是當時的裝箱。²

有關這兩段敘述，可推認蔣氏認為顧毓琇（字一樵，1902-2002）在參觀之餘不僅尋獲央圖書籍，也是將書籍運回南京的關鍵人物。目前國家圖書館相關館史記載，如 2003 年出版之《國家圖書館七十年記事》、2010 年

¹ 蔣復璁，〈我與中央圖書館〉，《近代中國》11（1979 年 6 月），頁 162-170。

² 蔣復璁口述，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年 5 月），頁 58-59。

出版之《國家圖書館七十七年大事記》亦以顧毓琇為發現遭劫古籍之關鍵人物。除了蔣氏的說法，對於抗戰時期央圖留港遭日劫掠圖書尋獲究竟為何人、何單位所尋獲，隨著史料、回憶錄的開放，近年來諸家有不同引述。

本文認為，有關於歷史事件敘事探究 (narrative inquiry)，其內容係由敘事者或記錄者個人所處情境，伴隨文化經驗與時空背景之間的關聯互動而被建構出來。為了瞭解央圖留港古籍遭日劫掠圖書尋獲過程，本文將透過相關文獻分析與史料爬梳，釐清相關研究之觀點來源，藉由敘事研究取向 (narrative approaches)，探討各方說法的遞變過程，以期獲得這些被研究者建構出來的尋寶者們 (treasure hunters) 是如何加入或者被附會為 1946 年尋獲央圖流落日本境內古籍的貢獻者。至於這批圖書數量、清單，如何返還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諸案日後將另外撰文討論。

二、 1941 年底以後央圖留港遭日劫掠圖書之過程

1937 年 8 月 15 日，日機空襲南京後，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以下簡稱央圖或央圖籌備處）將重要圖書封存 262 箱，運送南京朝天宮之故宮博物院庫房。至 11 月 18 日，央圖奉令自行規畫西遷後，又於這批圖書中提取重要西文與善本圖書 130 箱，運送南京下關貨輪碼頭，啟程往長江上游疏散。11 月 23 日，央圖圖書運抵武昌，暫寄存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

至於留在南京之財產、圖書與古籍雕版則全部遭日軍有計畫性地破壞。³

日軍蓄意摧殘中國高等教育與研究資源，企圖整個消滅中國文化機構，使之無書籍可讀、無材料可資研究，如位於上海之中華書局與世界書局，在戰爭初期悉數遭日軍劫掠，使得戰時勉強開辦之各級學校竟無書可用。⁴ 另一方面，歐美重要學術機構如哈佛大學等，在中國對日抗戰時期也大肆蒐購流落書肆之古籍，造成文物大量流出中土。如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首任主任恆慕義（Arthur William Hummel, Sr., 1884-1975）在 1940 年底即受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之訓令，到烽煙四起之中國華北地區進行 6 週購書之旅程。⁵

在日軍積極發動侵略的存亡危機下，中國官方學術與教育機構尚且不能自保，更何況是民間私人藏書樓。國民政府為解決文物流落海外的迫切問題，在政府與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Returned British Boxer Indemnity Commission，以下簡稱庚款董事會）的支持下，央圖籌備處蔣復璁主任乃與鄭振鐸（1898-1958）等人於 1940 年至 1941 年期間秘密籌組「文獻保存同志會」，⁶ 進行前所未有的古籍蒐購與搶救行動，最後共購得古籍 4,864

³ 〈國立中央圖書館概況〉，《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 1 卷第 3 號(1947 年 5 月)，頁 47。

⁴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徵書緣起」(1939 年 1 月)，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檔號：061-016。

⁵ 參見恆慕義之子恆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 Jr.1920-2001）訪談錄。“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Arthur William. Hummel, Jr.”, [http:// www.adst.org](http://www.adst.org) (Accessed date :2016/11/14)。中國大陸學者在描述此歷史時，往往將恆慕義漢名誤植為為赫美爾，如陳福康，《鄭振鐸年譜》上冊（山西：三晉出版社，2007 年），頁 369。

⁶ 其他參與之重要人士還包括葉恭綽、徐鴻寶、張壽鏞、何炳松、張元濟，以及張鳳舉。

部，合計 48,000 多冊。由於購置圖書之行動多在日本控制之淪陷區進行，然後透過上海、香港等地輾轉郵寄至重慶。這項計畫實際上僅成功進行完成一次，也因郵資不斐，郵寄古籍之數量包裹數無法採取大量以及集中策略，由香港寄送重慶之郵資竟高過於寄送至美國。

為了保護購藏古籍之安全，蔣復璁主任一度與中國駐美大使胡適（1891-1962）聯繫，建議仿效國立北平圖書館等單位將文物運送到美國之案例，並由之江大學（Hangchow University）職員返回美國之便，將古籍運送到中華民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⁷ 1941 年 10 月，經蔣復璁、鄭振鐸商議，鄭氏認為古籍疏散當以「運美為最上策」。⁸ 於是，在胡適與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主任陳君葆（1898-1982）的協助下，暫放在該校之央圖購藏古籍赴美案再度被提出。最後，計畫於 12 月 6 日由美國輪船格蘭特總統號（*President Grant*）搭載自香港開出。

就在重慶、上海、香港等單位，各為尋找失古籍文獻努力之時，日軍已於 1941 年 12 月 8 日發動珍珠港事變（Pearl Harbor Attack），同日進攻香港，與英軍及華人展開攻防戰（The Battle of Hong Kong，8-25 December 1941）。12 月 25 日以後日軍完全控制局面後，並接管香港大學

⁷ 「蔣復璁致文獻保存同志會（渝庚補第 892 號密件）」，依前後發文時間約在 1941 年上半年，「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編號 A0362。

⁸ 「鄭振鐸致蔣復璁」，1941 年 10 月初，「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編號 0092-B0094。

校舍，掠奪圖書儀器，展開恐怖軍事統治。陳君葆等人因此與上海、重慶失去聯繫。

另一方面，央圖、庚款董事會、中國駐美大使館等三方面對於格蘭特總統號是否已將書籍載運上船，航行是否安全，毫無所悉。如果書籍未上船，那麼是否遭到日軍掠奪？於是，央圖原暫存馮屏山圖書館之 110 箱善本古籍下落成謎。

三、 提供央圖在港遭掠古籍下落的貢獻者與消息來源

對於央圖存放於馮屏山圖書館古籍狀況，按理當時主持館務的陳君葆應該最為清楚，但當時局勢混亂，陳氏後來追憶這段往事，表示自 1942 年 1 月 10 日起他就不斷被搜查，從 2 月 9 日以後被要求待在香港花旗銀行大樓（City Bank of New York Building），看守圖書文物。未久日軍調查班少校宮本博（Major Miyamoto）就到館，並挑選館內重要圖書運載到日本。⁹ 3 月 22 日馮屏山圖書館被迫交日軍香港總督部調查班管理。¹⁰

1941 年底央圖古籍運美移存行動，因日軍入侵而功虧一簣，但即便是戰局進行激烈的時刻，負責出資購書的中英庚款董事會與央圖仍不放棄探索任何可能尋回古籍的線索。1942 年 8 月 8 日，央圖收到中英庚款董

⁹ 尹耀全(Y C Wan), "Librarie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1 - 45", Hong Kong Libra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http://hkla.org/newsletter/Sep06.pdf> (Accessed date:2016/1115)

¹⁰ 陳君葆，《陳君葆日記》卷 2:1941-1949 (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 年)，頁 65。

事會杭立武的來信，著名的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9）於6月20日來信通知，該會所購善本書已多為日本「波部隊」運至東京。¹¹ 陳寅恪係於1941年受香港大學聘為中文系客座教授。1941年底香港陷落後，他與陳君葆，以及據說擁有央圖寄存圖書清單的文學院馬季明教授（1883-1959）保持密切關係。1942年5月1日，陳寅恪語陳君葆表示「數年來託命之所，今生恐無重見之緣」，自香港北返桂林。¹² 然而，日軍波部隊即為當年負責廣東與香港軍事行動的中國派遣軍第23軍部隊，而實際作戰則由第38師團所轄3個步兵聯隊所執行。從陳寅恪傳達內容不過寥寥數語，證明書籍的確在日軍手中，而不是失蹤在原本應該前往美國的格蘭特總統號輪船上。這對於如何尋回書籍下落，並未有太大幫助。這段訊息或許非陳君葆請託交付，否則以陳寅恪的博聞強記的記憶力，相關內容當不至於只是隻字片語。

根據日本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鞆谷純一教授的研究，1942年初在馮平山圖書館進行掠奪圖書的調查班成員，包括宮本博少校（第23軍司令）、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之華僑問題專家須山卓、伊斯蘭研究學者前嶋信次、調查局圖書館大瀧榮一等人。其所掠奪之書籍除該館圖書外，亦包括央圖、北平圖書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嶺南大學之重要寄存圖書、古籍。而這

¹¹ 「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蔣復璁函教育部」，1942年8月8日，《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以下簡稱《館史文獻》），編號A0036-A0037。

¹² 陳君葆，《陳君葆日記》卷2，頁75。

批書在同年 11 月 26 日由陸軍省以戰利品為名交由共計 200 箱 4 萬冊，運交文部省，12 月 1 日，開始交由帝國圖書館進行清點。¹³ 另外，當時負責此任務的帝國圖書館的岡田溫在戰後回憶也提到，這批書在 1944 年經著名漢學家長澤規矩也（1902-1980）的協助，在 1 月開始整理與編目，至同年 7 月完成，並於 8 月 11-12 日限額邀請專家學者 30 名閱覽。未久，隨著美軍大規模空襲東京，部分書籍也隨貴重圖書疏散到日本鄉間。¹⁴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正式向同盟國（Allied Powers）宣布無條件投降，同年 9 月 16 日，英國政府正式接受香港日軍投降。11 月 18 日，重獲行動自由的陳君葆即分別寫信向中英庚款董事會杭立武與央圖蔣復璁館長說明 111 箱古籍被挪出港大經過，並補充當地尚有 520 冊古籍仍在館內。¹⁵ 但遭日軍掠奪書籍存放之地點，以及何人可負責接洽索回，陳君葆並未提供建議。

究竟戰後何人提供央圖掠奪書籍下落的線索，各方說法不一，以下謹就目前學界與本文研究所提出之觀點，進行整理如下表：

¹³ 鞆谷純一，〈帝國図書館の略奪図書〉，《情報学》6:1(2009)
http://dlisv03.media.osaka-cu.ac.jp/infolib/meta_pub/G0000007repository_111S0000001-0601-2 (Accesses date: 201611/18)

¹⁴ 岡田溫，〈終戦前後の帝国図書館〉，《図書館雑誌》59:8 (1965.8)，頁 276-277.

¹⁵ 陳君葆，《陳君葆日記》卷 2，頁 414。

表 1、近人已公布紀錄或研究有關央圖寄存馮屏山圖書館遭劫掠古籍下落

提供線索者	提供資訊時間	對於書籍下落的說明與描述	資料出處與主張來源
蔣復璁委託中華民國駐日軍事代表團協尋，顧毓琇受託	1945年9月	央圖蔣復璁館長曾表示1945年9月返回上海與南京後曾委託中華民國駐日軍事代表團代為訪查；後來顧毓琇（1902-2002）在日本帝國圖書館找到。	蔣復璁，〈我與中央圖書館〉，《近代中國》11期(1980)。
日人樂滿與江村、竹籐	1946年1月24-25日	陳君葆與端納上尉到赤柱提審日人樂滿與江村，兩日人將事情推給神田與島田；竹籐則完全拒絕透露。	陳君葆，《陳君葆日記》卷2，頁415。
陳君葆友人博薩爾	1946年1月21日至2月1日	1946年陳君葆友人博薩爾隨遠東委員會到日本審查日本戰爭罪行，博薩爾給陳氏另一位友人馬提太太的信中，說他在東京上野公園發現一百一十一箱書籍；博薩爾並立即向在東京的中國大使館報告。*	陳君葆，《陳君葆日記》卷2，頁448。 *當時中國駐日本並未設置大使館，應為駐日代表團。
不明人士	1946年2月中	1945年底至1946年初，教育部、外交部、軍令部等單位在香港、臺、日三地調查。 1946年2月中，有人在東京上野公園帝國圖書館發現所藏永樂大典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印記，繼而又陸續在其他書上發現除同樣印記外，還有嘉業堂藏書印。 近35,000冊被劫奪古籍，除小部份先行專機運回之外，大部份則從日本搭船載運至上海，1947年2月，返抵南京的國立中央圖書館	1.盧錦堂，〈劫餘玄覽幸遷來〉，收入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編，《搶救國家珍貴古籍八十種圖錄，1940-1941》(臺北:國家圖書館，2013年)，頁27-29。 2.蘇精，〈抗戰時祕蒐購淪陷區古籍始末〉，《傳記文學》35:5(1979)，頁113-114。

顧毓琇偶然尋獲	1946年2月25日	<p>1.顧毓琇前往日本帝國圖書館參觀，認出央圖藏書章，於是將書運回南京，一本不缺。</p> <p>2.顧毓琇作為中國政府的代表，通過盟軍總部從日本取得一批科研設備運回國內，他認為中國也應該研究原子能科學。在參觀東京帝國圖書館時，竟發現有幾箱善本書是由南京中央圖書館劫掠去的，即向日方索回。</p>	<p>1.蔣復璁，《蔣復璁口述回憶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頁59。</p> <p>2.顧毓琇紀念館， http://www.guyuxiu.cn/hy/xinminwanbao1.htm (存取日期2016/11/18)</p> <p>3.有關顧毓琇抵日本日期一說在2月25日，另一說在3月。</p>
張鳳舉	1946年4月1日至6月6日	<p>1946年3月底，教育部派員出席盟國對日委員會代表團會議。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1895-1986）曾於戰時參與「文獻保存同志會」，熟悉央圖購置古籍，乃與李濟之等人受命交涉。自1946年4月1日至6月6日期間，張氏至東京次日與美軍首談歸還日軍自香港掠來中央圖書館善本130箱書與其他文物事。4月8日帝國圖書館目睹該善本書。10日左右與美軍下今日方。6月1日13萬5千餘冊歸還中華民國代表團處。後陸續運回滬納入中央圖書館。</p>	<p>「張鳳舉日記」(原件現存國家圖書館)張衍華先生2012年11月30日捐贈有關央圖書籍返還之相關部分日記。 http://www.angelfire.com/art2/galleries/1940Diaries/NationalCentralLibrary.html</p>

李濟與王世襄等有關人員	約 1946 年 3 月至 12 月	上海大學陳文平教授訪問王世襄（1914-2009）時，整理王氏談話，認為李濟與他等有關人員抵達日本後多方尋覓，參觀日本公私博物館及文化機構，調查被劫文物，順利追回中央圖書館暫存馮平山圖書館之善本古籍。 王世襄係 1946 年 12 月中旬抵達日本。	*教育部係於 1946 年 3 月 6 日提報外交部請聘李濟之、張鳳舉、徐鴻寶為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以利文物調查工作。 「被日掠奪文物近 200 萬件珍品仍散落索回幾乎無望」，中國新聞網轉引《廣州日報》2015 年 9 月 15 日，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5/09-15/7523584.shtml （存取日期 2016/11/18）
-------------	--------------------	---	--

四、顧毓琇尋訪古籍之說的謬誤形塑與真相

從上節本文所形塑、整理之有關各方提供與主張央圖戰時留港善本古籍遭日本劫掠之下落與尋獲者之內容可知，早在 1945 年 11 月 18 日，陳君葆向中英庚款董事會杭立武與央圖蔣復璁館長進一步說明古籍遭劫與存港數量之前，蔣復璁自稱已在 9 月「返回上海與南京後曾委託中華民國駐日軍事代表團代為訪查」，展開調查，但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係於 1946 年 5 月 9 日才正式成立，其前身原為「中國駐盟軍總部軍事連絡官辦事處」，但外界多稱其為駐日代表團，實際上該處任務主要負責敵俘與僑民遣送作

業，¹⁶ 現有紀錄而言，亦未發現在 1946 年 1 月 1 日以前出現任何有關央圖聯繫該處之文件。僅有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主任杭立武在 1945 年 12 月下旬曾透過外交部探詢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以下簡稱 GHQ) 有關派員前往調查是否可行。但 GHQ 表達個別派遣工作尚屬不便，但歡迎中國派遣專家，隸屬總務聯絡員下工作；也就是必須受到盟軍行動管制。

與央圖同樣在 1942 年初有古籍寄存馮平山圖書館籍遭日軍劫掠的國立北平圖書館，主持該館館務之袁同禮館長（1895-1965）在本案所掌握的情報更為具體。1946 年 1 月 31 日，教育部發函外交部，根據袁同禮的說法，央圖原寄存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的善本圖書 120 箱，原擬暫存寄送到美國的古籍，因故中止。1941 年 2 月期間為日本竹籐峰治帶領日軍調查班宮本博少佐、肥田木近中尉將此批圖書強行劫掠，並以東京參謀本部封條。當時以為均已運往東京。另據香港友人調查，日軍因運輸困難，或可能運到臺灣。擬請臺灣陳儀長官及在東京之外交部駐日聯絡官分別追查。教育部並掌握竹籐峰治當時為香港軍政府（military government）所拘留，並移送日俘集中營，請外交部協助交涉詢問。¹⁷

¹⁶ 參見楊子震，〈中國駐日代表團之研究－初探戰後中日·臺日關係之二元架構〉，《國史館館刊》19 期（2009 年 3 月），頁 58。

¹⁷ 「教育部函外交部」，1946 年 1 月 31 日，《館史文獻》，編號 A0070-A0071。

袁同禮提供線索中，所謂「香港友人」，應為與他素有深交的陳君葆，方能得知劫掠圖書之日本相關人士姓名。從陳氏日記可知他在日本統治時期已知日軍調查班宮本博少佐、肥田木近中尉將此批圖書強行劫掠；而在香港脫離日本統治後即奔走清點各地該館存放圖書，並於 1946 年 1 月 24-25 日與英國軍政府軍事法庭端納少尉 (H. G. Donald)¹⁸ 及三名軍官到赤柱監獄，提審日本香港總督部民政部首腦 Rakuman Kinji¹⁹ 與江村、竹籐峰治，但 Rakuman Kinji 表示 1945 年 1 月才到香港，對於過去毫不知情，他並將事情推給負責香港圖書館事業的日本學者出身之官員神田喜一郎 (1897-1984) 與島田謹二 (1901-1933)；而竹籐峰治亦加以否認。²⁰

來自陳君葆的線索，對於教育部、央圖可以說是相當重要。由於 GHQ 主張依國際法原則處理掠奪品歸還問題，有關日本返還盟國圖書文物或取得戰利品，都必須在嚴格的監督下進行。²¹ 1946 年 1 月 8 日，外交部發函教育部告知 GHQ 曾於 1945 年 10 月 12 日起規定：「凡往來日本具有歷史文化及美術價值之進出口品，不論來自何地均予以禁止，不論其所有人為何，將給予完全保護」。中國政府如要取回日本於戰爭期間掠奪中國之戰利品，必須要有更明確的證據。因此，教育部乃在 1946 年 1 月 31 日，以「攸關國家文獻」為由，迅速發函外交部要求協助調查央圖古籍下落，

¹⁸ 陳君葆原文端納無英文姓名，職銜也誤植為上尉。

¹⁹ 日文原名不詳，其職位為日本佔領香港總督部民政部首腦。

²⁰ 陳君葆，《陳君葆日記》卷 2，頁 427。

²¹ 岡田溫，〈終戰前後の帝国図書館〉，《図書館雜誌》59:8 (1965.8)，頁 279。

並追查宮本博、肥田木近，以及請外交部轉請香港軍政府提審竹籐峰治，已查出此書存放地點。²² 另外央圖也在 2 月 18 日另外發函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要求協助同樣事宜。²³ 另一方面，由於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啟動調查。經各方積極處理，本案在 1946 年初很快就獲得中華民國政府派駐香港與日本之外交單位回應：

1. 1 月 23 日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主任杭立武，向外交部推舉曾留學日、法，並參與文獻保存同志會之前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加上嫻熟英語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之（1896-1979），前往日本調查對日文物資產求償。至 3 月 6 日，復加派徐鴻寶（1881-1971）為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以利文物調查工作。
2. 2 月 23 日，外交部亞東司等通知教育部，中央圖書館寄存香港之「四庫全書」約三萬冊現存東京上野圖書館。該司司長楊雲（1901-1967）於²⁴ 赴日東京參加同盟國遠東委員會（Far Eastern Commission）考察時，發現央圖存香港之「四庫全書」遭日軍劫掠約三萬冊，現存東京上野（帝國）圖書館。經赴該館訪查約三萬冊，一部分業經該館整理編目，一部分為避免轟

²² 「教育部函外交部」，1946 年 1 月 31 日，《館史文獻》，編號 A0060。

²³ 「中央圖書館函臺灣行政長官公署」，1946 年 2 月 5 日，《館史文獻》，編號 A0059。

²⁴ 兼駐日軍事代表團副團長身分。

炸轉往外地，經交涉約 3 月初運回。²⁵

3. 3 月 9 日，經外交部駐廣東廣西特派員公署香港辦事處特派員郭華德的聯繫，取得之前與陳君葆提審竹籐峰治等人的英國海軍預備軍官端納個人在 2 月 22 日所撰寫調查報告。端納在提審前後三星期曾尋訪書籍下落，該批 101 箱已確信被運往日本東京帝國圖書館，並在戰爭期間運往鄉下疏散。²⁶ 郭氏與端納持續聯繫直到同年 6 月，書籍「全部尋獲」為止。郭氏為感念端納「以一人之力，窮半載之工，尋回關係我國家之善本」，建議政府頒給獎勵章狀。²⁷
4. 3 月 14 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駐東京聯絡參謀唐啟琨報告 130 箱計 3 萬餘冊圖書已於帝國圖書館尋獲，經交涉已允歸還，待編目錄後交上海教育局長顧毓琇及外交部劉增華專員設法運回。²⁸
5. 3 月 15 日，外交部派駐日盟軍最高統帥部聯絡參謀辦事處專員劉增華呈外交部表示，日人竹籐峯治劫掠香港馮平山圖書館善

²⁵ 「外交部亞東司朱世明、楊雲送國立中央圖書館」，1946 年 2 月 23 日，「要求日本歸還圖籍(一) 劫物歸還」，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0200101190027。

²⁶ 「外交部駐廣東廣西特派員公署香港辦事處電呈外交部辦理交涉中央圖書館所失書籍經由」，1946 年 3 月 4 日，「戰時圖書徵(集)購案」，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020000038431A。

²⁷ 「外交部駐廣東廣西特派員公署香港辦事處電代電」，1946 年 6 月 28 日，「戰時圖書徵(集)購案」，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020000038431A。

²⁸ 「教育部」，1946 年 3 月 26 日，《館史文獻》，A0072。

本，經詳加密察，已在上野公園帝國圖書館，查得該館保管約 25,000 冊，因空襲疏散到伊勢原者約 1 萬冊，業經該館圖書館員岡田溫所承認。²⁹

從各方回應之訊息，約略可知外交單位未必知道央圖遭掠書籍之內容，因此才出現所謂央圖存香港之「四庫全書」遭日軍劫掠約三萬冊之誤報。實際上，本案與「四庫全書」並無任何關連。

除了中華民國政府極力透過各種管道搜尋，陳君葆在香港相識之友人博薩爾，他在陳氏日記曾以至少三種姓名稱呼他，如博沙或博。此人真正身分為 Charles Ralph Boxer (1904-2000)，香港著名英國歷史學者、漢學家與古籍藏書家；他出身軍人世家，1941 年香港保衛戰時，曾因傷為日軍所俘虜，直到 1945 年都在戰俘營 (POW)，而其藏書也遭日軍劫掠。1946 年 2 月，博薩爾以少校身分參與英國派駐日本遠東委員會工作直到 1947 年。他在給陳君葆另一友人的信中提到，為了找回自己的書，在東京發現自己藏書千餘冊，經立即交涉後移到英國大使館，然後隨他在 2 月初返回美國。³⁰ 除了他自己的書，還曾在東京上野公園帝國圖書館發現央圖 111 箱書籍，博薩爾並立即向在東京的中國使館報告，並把陳君葆對這

²⁹ 「外交部代電教育部」，1946 年 3 月 19 日，「戰時圖書徵(集)購案」，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020000038431A。

³⁰ 博薩爾藏書後來捐贈與美國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分校圖書館。

件事看法紀述告訴中國官員。³¹ 陳君葆知道博薩爾發現央圖古籍消息時，已經是 1946 年 6 月 16 日，而他推測博薩爾找到書籍的時間約在 1 月中至 20 日左右的時間，也就是博薩爾抵達日本的初期。³²

如果陳君葆日記與博薩爾取回書籍之事實一致，那麼中國政府派駐東京相關官員，如外交部楊雲等人在 2 月下旬抵日時應該就已經知道上野帝國圖書館存放央圖古籍，而外交部專員劉增華則確認端納所提供空襲疏散到伊勢原之位置。因此，無論是 2 月 25 日才到東京參觀展覽的顧毓琇，或者稍晚到日本的張鳳舉、李濟之、王世襄等人，其所得消息已經都晚於駐日單位。換言之，他們到日本只是確認書籍身分與交涉文物回到中國之運送過程。

既然中國官方明知古籍已由博薩爾發現，但為何蔣復璁後來每談這段歷史，皆以顧毓琇為尋獲古籍之關鍵人物。有關這一點，張錦郎在〈抗戰時期搶救陷區古籍諸說述評〉認為顧毓琇搭乘美國軍用機飛抵東京，「總要先拜會大使館，大使館應會說這批書已找到了。參觀還是可以去參觀，以便回國報告說看過這一批書」。³³ 當時中華民國在日本並無大使館，先參觀，然後發現央圖古籍在日本帝國圖書館，此發現文物模式幾乎與博薩

³¹ 陳君葆，《陳君葆日記》卷 2，頁 448。

³² 有關博薩爾抵日時間 Alden, Dauril, 也是主張 1946 年 1 月初，See Alden, Dauril, “An enduring affair Charles R. Boxers fascination with Japan”, *Bulletin of Portuguese - Japanese Studies*, 1, December, 2000, pp. 153-154.

³³ 張錦郎，〈抗戰時期搶救淪陷區古籍諸說述評〉，《佛教圖書館館刊》第 57 期(102 年 12 月)，頁 98, <http://www.gaya.org.tw/journal/m57/57-lib.pdf> (存取日期 2016/11/18)

爾所述相同。對央圖而言，顧毓琇在 1940 年擔任教育部次長時極力推動支持中英庚款基金董事會撥款提供央圖搶救古籍，甚且影響陳立夫部長欣然同意，故表示「在經費方面，願全力支持」，³⁴ 以彰顯政府護持中文古籍淵源甚深，故如由外國人士發現古籍，或者公開宣布由顧毓琇在日本尋回這批古籍，其意義自然更顯重大。因此，在館史記載敘事中，顧毓琇前往日本帝國圖書館參觀，認出央圖藏書章，於是將書運回南京，一本不缺，遂成為官方說法。

顧毓琇不僅與蔣復璁關係密切，3 月 31 日亦抵日本的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朱世明（1898-1965）更與他是清華大學前後期同學。朱氏為 1922 年畢業生，而顧氏則為 1923 年畢業，與 8 月 16 日抵東京之吳文藻亦為清華大學同班。倘若代表團內部有意塑造顧氏尋獲善本之功，亦不無可能。但無論是蔣復璁或者代表團內部如何力捧顧氏，總有旁觀者另有說法，如當年參與圖書歸還業務的王世襄曾在回憶錄提到許廷長撰〈民國時期的中央圖書館〉，《中國典籍與文化》，對於許氏所提到這段過程採顧毓琇參觀帝國圖書館地下室及伊勢原鄉下發現，後與美軍協商後，全部運返南京之說法，³⁵ 王氏顯然並不以為然，而另以介紹讀者參閱他所撰，1946 年 12

³⁴ 張錦郎，〈蔣復璁著《珍帚齋文集》補正〉，《佛教圖書館館刊》第 50 期（98 年 12 月），<http://www.gaya.org.tw/journal/m50/50-lib3.htm>（存取日期 2016/11/18）。

³⁵ 原文誤將出版年誤值為 1955 年，正確應為許廷長，〈民國時期的中央圖書館〉，《中國典籍與文化》3 期（1995 年），頁 72-77。參見王世襄，《王世襄自選集—錦灰不成堆》（北京市：三聯書店，2007 年），頁 57。

月下旬到日本時，所見央圖古籍除 10 箱在代表團外，另外 107 箱仍由日本文部省保管，直接駁斥所謂顧氏發現古籍並運返古籍之說法。³⁶

五、 結論

有關抗戰時期央圖滯留香港馮平山圖書館善本古籍遭日本劫掠之歷史，歷來多以 1946 年 2 月顧毓琇訪日參觀尋獲作為敘事之核心，包括 1980 年蔣復璁撰寫具回憶錄性質的《我與中央圖書館》一文，或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蔣復璁進行之口述訪談，大抵構成日後相關論述的基本材料。然而，隨著陳君葆日記與 1990 年代以後王世襄回憶錄，以及國史館、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開放，所謂顧毓琇訪日參觀尋獲一說，已非定論。

透過各方材料的比對，本研究發現相關線索仍出自於香港本地，即馮平山圖書館主任陳君葆、英軍少尉調查官端納、英軍少校也是著名漢學家與藏書家博薩爾等人棄而不捨，從戰爭結束後就積極追蹤，並在相當程度上與中華民國政府外交機構，包括外交部駐廣東廣西特派員公署香港辦事處、駐日代表團等單位保持聯繫；另一方面，駐日代表團、教育部所屬「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也多能利用前述三方所提供資訊，故終能在 1946 年 2 月底以前就掌握上野公園帝國圖書館與疏散到伊勢原等地之古籍存放位置，6 月底前尋獲所有圖書。如不考慮索還書籍所遭遇之盟軍內

³⁶ 王世襄，《王世襄自選集—錦灰不成堆》，頁 73。

部協調問題，本案基本上已達到對日追討善本古籍之任務目標。

由於顧毓琇曾擔任教育部次長，他之於央圖戰時搶救古籍撥款有恩，而顧氏又與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南京蔣經國等政治人物關係密切，導至日後蔣復璁回憶這段歷史，竟將發現國家善本之功，形塑為顧毓琇一人獨力完成。實際上，論各方所提出之探索央圖善本下落，具有具體的事蹟與聯繫，真正引導外交部派駐港澳與駐日代表團外交官訪得善本，則當屬英人博薩爾少校與端納少尉之事蹟，青史長流。

參考文獻

一、史料

1 國家圖書館館藏

《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

「張鳳舉日記」(原件現存國家圖書館)

2.國史館

《外交部檔案》

《教育部檔案》

3.陳君葆，《陳君葆日記》卷2(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

二、論文

1. 〈國立中央圖書館概況〉，《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1卷第3號(1947年5月)
2. Wan, Y C Wan, " Librarie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1-45", Hong Kong Libra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http://hkla.org/newsletter/Sep06.pdf> (Accessed date:2016/1115)
3. 岡田温，〈終戰前後の帝国図書館〉，《図書館雑誌》59:8(1965.8)
4. 張錦郎，〈抗戰時期搶救淪陷區古籍諸說述評〉《佛教圖書館館刊》第57期(102年12月)
5. 張錦郎，〈蔣復璁著《珍帚齋文集》補正〉《佛教圖書館館刊》第50期(98年12月)
6. 許延長，〈民國時期的中央圖書館〉，《中國典籍與文化》3期(1995)
7. 楊子震，〈中國駐日代表團之研究—初探戰後中日·臺日關係之二元架構〉，《國史館館刊》19期(2009年3月)

8. 鞆谷純一，〈帝国図書館の略奪図書〉，《情報学》6:1(2009)
9. 蔣復璁，〈我與中央圖書館〉，《近代中國》11 (1979年6月)
10. 蘇精，〈抗戰時秘密蒐購淪陷區古籍始末〉，《傳記文學》35:5(1979)

三、圖書

1. 王世襄，《王世襄自選集—錦灰不成堆》(北京市：三聯書店，2007年)，頁57。
2.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搶救國家珍貴古籍八十種圖錄，1940-1941》(臺北：國家圖書館，2013年)
3. 蔣復璁口述，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5月)

四、電子資源

1.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Arthur William. Hummel, Jr.", 恆慕義之子 恆安石 (Arthur William. Hummel, Jr.1920-2001) 訪談錄。
(<http://www.adst.org>) , Accessed date:2016/11/14
2. "Hong Kong Libra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http://hkla.org/newsletter/Sep06.pdf>) , Accessed date:2016/11/15